



作家说

肖复兴：我不希望把儿童文学写成甜蜜蜜的棒棒糖

童年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对童年的描绘让时光倒退，70多岁的作家回到那个胡同里的少年。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在龙潭湖游泳、在东单体育场跑步打球、在小饭馆吃盖浇饭、在工地上找废铁铜丝……这是肖复兴的童年往事，也是他在最新出版的少年成长小说《兄弟俩》中讲述的故事。

肖复兴借小说中徐老师的手，在黑板上给孩子们写了一首冰心的小诗，为了后来的回忆，小心翼翼地描绘你现在的图画。这是他读中学时，在西单旧书店买到的一本开明书店版的《繁星春水》中看到的，短短两句，记了60年。

童年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对童年的描绘让时光倒退，70多岁的作家回到那个胡同里的少年。

中青报 中青网：《兄弟俩》写的是你自己的童年。在你记忆中，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最不快乐的又是什么？

肖复兴：我5岁那年，生母突然病逝，父亲回老家，为我们领回一个继母，这之后很长时间内，我都不快乐。

那时，唯一的姐姐还不到17岁，为了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远离北京到内蒙古修铁路。我总觉得孤独无助，甚至绝望。上小学后，我常在晚上，一个人偷偷地爬到我家房顶上，望着夜空发呆，想心事。房顶视野开阔，能看到北京火车站的钟楼，姐姐就是从那里坐上火车离开的。

每一次姐姐回内蒙古，如果我和弟弟没有课，都会去送姐姐。每一次姐姐坐的火车开走了，我和弟弟都会躲在站台的大圆柱子后面偷偷地哭。如果由于上课不成姐姐，我会偷偷地哭得更伤心。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在房顶上想心事，也从没有人知道那时候是我最不快乐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一直到我读小学四年级。那一年，我在家对面的邮局里花了1角7分钱买了一本《少年文艺》，其中有美国作家马尔兹写的一篇小说，叫《马戏团来到了镇上》。这是我读的第一篇小说，可以说，是它带我进入文学的领地。两个孩子渴望看马戏却最终没有看成，这样的故事在我心中引起了一种莫名的惆怅，一种夹杂在美好与痛楚之间的忧郁的感觉，让我知道除了我自己的痛苦之外，还有别的孩子一样有着说不出的痛苦。

我从此迷恋文学，文学让我快乐，帮助我修复心里的痛苦，并燃起了我的希望和想象。童年的快乐还是多于痛苦的，最快乐了，除了每年见一次姐姐之外，就是读书了。在《兄弟俩》这部小说中，没有写这些，这样的内容应该是新的小说了。

中青报 中青网：《兄弟俩》中的故事有一定的年代感，比如物质贫乏，现在的孩子还能理解小说中兄弟俩的处境吗？

肖复兴：这是我在写作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小说的书写，有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还有把这三种时态打乱交杂在一起。帕尼奥尔的《我父亲的光荣》写的是他的童年，属于跨年代；瓦尔特·本雅明的《驼背少年》写的也是他的童年，那是1900年前后。但是这些作品，我们现在依然爱读，并没有因为时间的阻隔而产生隔膜，相反让我们更加喜爱和珍惜。或许，这就是距离产生美，产生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吧，而且，孩子都有好奇心，也许还非常想窥测他们的父辈、祖辈是怎样度过童年的。

中青报 中青网：现在孩子的童年有什么缺失吗？

肖复兴：现在的孩子，物质比我小时候丰富得多了。我小时候，有钱人家的女孩子，抱着一个眼睛能眨动的布娃娃，就足以让我目瞪口呆；我们男孩子，只能蹲在地上、撅着屁股玩弹球，拍洋画。但物

最终，小林尚礼没有登顶，没有再挑战梅里雪山。他的双脚，止步于距峰顶剩下的那500米处。



肖复兴

质的丰富、高科技的发展，并不能直接让人们的精神同步提升。

我儿子在美国工作，今年暑假，他开车带着他的孩子去佛罗里达。这一年间，孩子都是在家里上网课，憋得实在够呛，得出气。他们去海边捡贝壳，去了一个星期。和我视频时，两个孩子兴奋得不得了，告诉我他们在海里还抓到了海星。向我描述海水退去时，藏在沙滩里的贝壳和寄居蟹纷纷露头的壮观场面。我不仅是被他们的兴奋所感染，也是为这些贝壳所感慨。之前没想到，这些没有一点科技含量的贝壳，能够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孩子的很多快乐，并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我们要鼓励孩子到大自然中去读另一本大书（注意，不是走马观花的旅游）那里能和孩子的天性密切联系在一起。

中青报 中青网：你小时候喜欢看什么儿童文学？

肖复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读《少年文艺》，四年级读到它时已经是1957年。在这之前的《少年文艺》是什么样子的，我特别好奇，便到旧书店找到一些，还是不全，便又到首都图书馆去借，一直把它们全部看完。

读中学时，《儿童文学》创刊，我开始买它。那时候的儿童文学作家，我特别喜欢任大霖、萧平、臧向真、刘真、王路遥和冰心、叶圣陶、郭风，以及外国的罗大里、盖达尔等人的作品，后来又读到了蒋风的《鲁迅论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买上了每年出版的一本全国儿童文学作品集，包括一本《1919年至1949年儿童文学作品选》。

那时候的儿童文学虽然没有如今这样的细分，这样的名目繁多，但是给予我很多营养，可以说，是儿童文学伴随我长大的。

中青报 中青网：你的不少作品都是写给孩子看的，也有多篇入选教材，给孩子看的文学，如何处理美好与残酷的关系？

肖复兴：儿童文学作品，风格题材多样，但我从小不怎么喜欢读童话，也不喜欢科幻作品，反而喜欢读现实主义的小说，觉得和自己所认识的现实生活接近。我特别喜欢瓦尔特·本雅明的《驼背少年》，写的是1900年他10岁前后在柏林发生的事情；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生的故事》第一卷，从1904年写起，也是他10岁左右的经历。他们都没有回避生活的苦难，其中包括战争和生离死别。

读中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萧平的

《三月雪》。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居然还保存着当年读这本书时记的笔记，记录着《三月雪》第一节开头：日记本里夹着一枝干枯的、洁白的花。他轻轻拿起那枝花，凝视着，在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棵迎着早春飘散着浓郁的香气的三月雪，弱弱的松树，松林里的烈士墓，三月雪下牺牲的刘云

《三月雪》写的是战争年代的故事，主角是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清纯可爱，和庞大而血腥的战争，有意做着鲜明对比。如果没有战争的残酷和妈妈牺牲的痛苦，不会有这样大的冲击力，小娟也不会成长得这样坚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面对生活挫折、痛苦，能够激励他们健康而坚强地成长。

我们现在的大人，常常一厢情愿、越俎代庖地替孩子去化解烦恼、忧愁，乃至过错。我的儿童文学中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苦难残酷的书写，也是远远不够的。缺少这方面文学作品的直面阅读，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因此，在这本《兄弟俩》中，我没有回避这一方面的书写，我不希望儿童文学写成甜蜜蜜的棒棒糖。

中青报 中青网：也有观点认为，孩子可以和大人看一样的书，对此你怎么看？

肖复兴：孩子当然可以和大人看一样的书。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旺盛的求知欲，特别想走进大人的世界，这是可以理解的，也要给予尊重，不过毕竟年龄摆在那里，并非所有的书都适合他们小时候看。因此，儿童文学的存在非常有必要。尤其是从学龄前到小学和初中阶段，儿童文学对于一个孩子成长所能起到的作用，往往是成人文学做不到的。

不过，我不希望孩子只读儿童文学，尤其在如今儿童文学过度繁荣、难免泥沙俱下的情况下，并非都是开卷有益。因此，挑选一些经过时间筛选、值得信赖的成人文学作品去读，是十分必要的，这同时也是锻炼提升孩子阅读能力的必要。

我一向主张，孩子的阅读层面需要踮一踮脚尖、踮一踮高，即使有些书读后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感觉，甚至一时没有完全读懂，也没有关系。我小时候的好多书，当时都没有读懂，只留下一些朦朦胧胧的印象，但它们依然留在我的记忆里，加深了我对文学的认知，也对我的成长有所帮助。

中青报 中青网：作家的年龄在增长，如何对一代又一代孩子的阅读兴趣保持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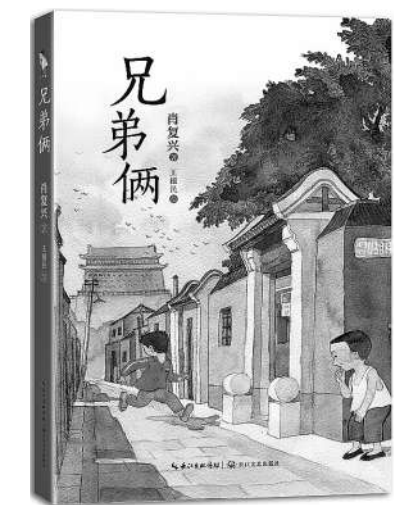
肖复兴：如何重返童年、重获童心，是如我这样年纪的人想写好儿童文学必须要面对的课题。我的做法很简单，也很笨，主要有两点：一是要和孩子有接触，知道现在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爱所好。我的两个小孙子10岁上下，正好帮助了我。没写这本《兄弟俩》之前，我把其中一些故事先讲给他们听，看看他们对哪些地方感兴趣，从而进行调整。

二是在写之前，先读一些和我要写的内容相关的别人的作品。在写《兄弟俩》之前，我选择的是重读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生的故事》第一卷，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细微的感觉和直通的路径。

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过：只有当我们成为大人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懂得童年的全部魅力。在童年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用明亮而春天的目光观察世界，在我们的心中都似乎明亮得多。童年的生活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淘洗，和长大成人后回眸的重新审视与认知，才有价值有意义，才有可能写好。

中青报 中青网：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肖复兴：我刚刚写完另一本儿童小说《春雪之约》，之前写的三部儿童小说《红脸儿》《合欢》《兄弟俩》，故事的矛盾基本发生在孩子之间，大人的出现，只不过是了解决这些矛盾。这一次，我想让故事的纠葛和矛盾，放在孩子和大人之间。小有能力的大人，小孩子身上潜能的喷发，甚至能够帮助大人、战胜大人，让彼此看到希望。我希望这部新的小说能够比前三部儿童小说写得有点儿进步。



□ 王钟的

贵州是游乐场，你走一会儿周围的景色就变了，但走很久，直线距离也前进得少得可怜。云南是跑步机，你走了很久，确实也前进得很远，但感觉还在同一个地方。2018年4月，媒体人杨潇从湖南长沙出发，以徒步为主，重走了300多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到昆明的西迁之路。《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下文简称《重走》）正是记录了杨潇这段独特经历。

如今，从长沙到昆明的路程，早已被便捷的现代交通工具取代。点到点的飞机自不必言，2016年12月，随着沪昆高铁全线通车，旅客在长沙吃了早饭，还赶得上昆明的中饭。哪怕走高速公路，也与当年的木炭汽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要想真正感受闻一多和查良铮们大概是“湘黔滇旅行团”最为人们所知的师生，为抵达昆明经历的曲折、付出的汗水、收获的体验，办法只有一个：走吧！

不同于近年来盛行的猎奇式旅行文学，杨潇以近乎学术规范的标准，引证了大量史料与访谈。几乎每到一个县城，杨潇都会与当地的史志办打交道。如果在听了西南联大师生留下的传奇故事以后，你希望更进一步，在思想层面接近这所最好的大学，它无疑属于值得选择的作品。

用现在的视角看，被赋予浪漫主义情愫的西南联大，其群星璀璨、大师迭出的伟大成就，似乎有点理所当然。但在当时的语境里，西迁，终究是一场仓皇的逃难。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撤，到三校师生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直至抵达昆明以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名的频繁变动，也足以说明国难当头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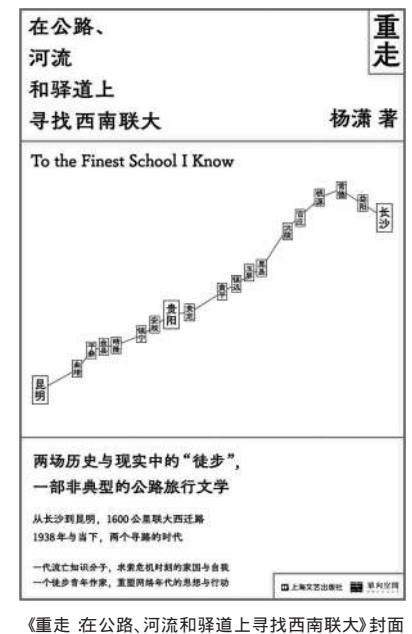
面临日寇侵入中国内陆的威胁，临时大学是走走留留，不是没有过争执，就生活而言，南下师生在长沙度过了一段堪称惬意的时光，湖南以其丰富物产持续供应着这座消费享乐气氛浓郁的省城；就政治上来说，不管是湖南行政当局，还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似乎都不希望大学在短期内离开。总司令不愿让大学迁来迁去，而就当时的舆论观感来说，昆明湖不在颐和园，大观楼哪如来云殿，西迁被视为“逃跑主义”。

后来的事实证明西迁是个正确的选择，尽管长沙直至抗战末期的1944年才沦陷，但几次长沙保卫战和焦土政策已然让这座古城沦为战争废墟。堪称二战期间举世罕见的受灾最严重城市之一。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住所遭遇日军空袭，航空炸弹在离家只有十几米的地方爆炸。作为城池营垒，长沙见证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史，而以发展文教事业所需的稳定环境看，它显然不再适宜。校方克服重重压力决定尽快西迁，最终给战时中国留下一缕文脉。

当时，从长沙到昆明有两条路线：一条是1937年开通的京滇公路（京指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这也是“湘黔滇旅行团”选择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从长沙经粤汉铁路到广州，转香港，再乘轮船到法属越南的海防，再通过滇越铁路北上昆明，也就是说去昆明还要出一趟国。但是，因为陆路艰险，且以步行为主，多数教授、女生和体弱者选择了更曲折的海路。根据《重走》的分析，安排学生步行到云南并不全然出于经济考虑，还有多习各地风土民情的理由，在本质上也是为了缓解迁校带来的舆论压力。在学术人与政治人两种身份之间灵活切换而不失底线。

尽管考察沿路民情只是一个借口，但在“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艰苦的旅途中，确实让师生对中国社会有了更直观的体会。在闻一多的指导下，学生刘兆吉完成了《西南采风录》的编写工作，书中搜集了途经西南地区的700余首民歌，朱自清、黄钰生、闻一多三位教授分别为该书写了序言。学生向长清完成了这趟漫长征程后写道：恐怖的山谷，罌粟花，苗族同胞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

当然，《重走》一书不仅有历史的钩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封面

沉，更有今与昔的比较。该书以其非虚构写作手法，找到湘黔滇旅行团与当下的结合点，也因此让诸多围绕西南联大叙事的作品中别具一格。如今，网络上流行在历史照片的所在地重新拍摄一张现在的照片，但因为沧海桑田的变化，照片并不足以实现过去与当下的连接。作者以文字之力，完成了影像记录无法呈现的部分。

比如，通过残存的历史建筑想象当年风貌，作者杨潇感受到了用文字重建一座城池的趣味。在贵州玉屏，旧时的县署改成了老气的星级酒店，当年学生打地铺的文庙大成殿变成了“数字影院”，中医院就是以前的关帝庙。杨潇的访谈和史料交织在一起，再稍稍用一点想象力，那些被拆毁的老房子就一排排立了起来。那些访谈对象的父辈、祖辈，当年也许就是在同样的地方迎接联大学生，见证那些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像普通人一样吃饭、喝酒、睡觉，像普通人一样抱怨旅途的疲劳、学校安排的不如意。

103岁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吴大昌是少数健在的“湘黔滇旅行团”成员，老教授思路清晰、身体康健，还在近期上映的电影《九零后》中出镜。像每个年轻人一样，旅行团抵达昆明的第二天，吴大昌也陷入了对人生意义的困惑。《重走》把最后一段留给这位世纪老人，意味深长又恰到好处。百岁高龄的吴大昌觉得冯友兰说的是对的：人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但是在1939年，他并不明白这一切，毕竟，他才21岁，一切才刚刚开始。

从西南联大的历史看，“湘黔滇旅行团”只是一段短暂的起点，它的辉煌画卷会在未来8年徐徐展开。不过，从文明的意义看，“湘黔滇旅行团”无疑是不平凡的开篇。正如胡适在纪念联大九周年纪念会上说的：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300多名师生，先是坐船，随后徒步，1600公里的旅程，为随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化留下了生动的注脚。也为当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再出发提供了无尽的启迪。

点而已。万物是否有灵？如许疑问，依靠人类目前的头脑，不会论争出个所以然。但是，只要走进苍茫的自然，面对巍峨的雪山，你就会生发出自己的认知。为了搜寻队友的遗体，小林尚礼住进了梅里雪山当地人的村庄。在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里，他重新发现了雪山，发现了与所谓文明世界迥然不同、甚至在很多人看来完全是落后的文化。而更为重要的是，他重新发现了自己。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却是一段绝不寻常的蜕变。承认自己有限、渺小，低下高昂的头颅，心怀谦卑与尊重，某种意义上等于重塑了一个人。而这样的蜕变，恐怕还不仅是面对神山就能形成。需要走进神山，只有在神山的怀抱里，才能听到大地的心跳。小林的几次转山，让他重新认识梅里雪山，重新认识自己，所思所想难以言表，却在心中清晰、笃定，他仿佛感觉到了梅里雪山昭示的那种神秘力量。

而灵则，也正是在这个时刻获得拯救。

最终，小林尚礼没有登顶，没有再挑战梅里雪山。他的双脚，止步于距峰顶剩下的那500米处。

但其实，他已经登完了那最后的500米。然而更多的人，依然执念在路上。

最后500米，造就了真正的登山者

□ 徐冰

如果有人问我，是否想再挑战一次梅里雪山？我会回答 NO。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将不再拘泥于狭义的登山本身，而会慢慢地去攀登距峰顶剩下的那500米距离。在遇见一个由衷想要去做的事情之前，我要先学着培育心中所缺乏的、之前被我漠视的那些东西。

这段话，是日本登山爱好者小林尚礼挑战梅里雪山失败后的心声。记录在他最近出版的《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这本书中。而这段经历和感受，则跟上世纪90年代日本登山者两次攀登梅里雪山失利有关。

1996年冬，以日本京都大学山岳部为主的中日联合登山队第二次向梅里雪山发起了挑战。5年前，1991年1月3日，当信心满满的登山队第一次挑战时不幸遭遇山难，中日队员共有17人被雪崩吞

噬，酿造成了迄今为止梅里雪山最大的山难。那一年登山，小林尚礼没有参加。但年轻同伴的消逝，却激起了小林对那座神山的执念，他要再次挑战梅里雪山。

再度挑战，小林尚礼志在必得。12月2日，小林与队友先行布置路绳，为大部分队员冲顶做准备。由于登山绳用完，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那时，他们距峰顶已不足500米。真正的挑战从这里开始。明天还会再来的。小林默默地下了决心。

可是由于天气突变，他们第二天没能冲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天气继续恶化，没有转好的迹象。经过反复权衡，登山队最终放弃了计划，第二次挑战再度搁浅。兴冲冲而来却铩羽而归，心中肯定有无限遗憾。但小林尚礼的所思所感更为复杂。

此番再度挑战梅里雪山的过程颇为不顺，登山队遭到了当地村民的抵制，先遣人员延宕5天没能进山。在村民心目中，梅里雪山是他们信仰中的神山，就如同自己的亲人一般。有谁愿意自己亲人的头顶被

陌生人脚踏呢？

村民还认为，登山行为给村子带来了祸端。自从几年前的第一次挑战之后，当地灾害就接连不断。而此次再度挑战的登山队下山后，原本作为基地使用了一个多月的房屋竟然被雪崩摧毁，小林和队友惊悚地逃过一劫。周围的大树全被雪崩摧折，看年轮，许多树都在百年以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至少近一百年没有发生过大的雪崩。面对此情此景，任谁恐怕都会心中忐忑：难道真的有一种神秘的看不见的力量？

此番经历让小林感慨万千，距峰顶剩下的那500米，仿佛成为一种隐喻。似乎有一种力量，是他心中缺乏却又不容漠视的，但那究竟是什么，当时还模糊不清。于是，慢慢地去攀登这500米的心路历程，就在《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中表达出来。

这是一本寻找之书。不仅寻找遇难队友遗体，让他们与家人团聚，以慰亲人思

念之情。同时也寻找登山、挑战这类行为的意义，寻找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不同文化如何沟通，以及灵魂和命运应有的姿态。因此本质而言，这也是一本经由寻找而重新认识自我之书。

认识你自己，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启蒙运动所开启的人的自我意识觉醒，让人第一次认识到人之为人的，人是万物之灵长。在这样的自信激励之下，人热衷于探索未知世界，热衷于战天斗地、改造自然，更勇于挑战、征服荒野山川，彰显个人的勇气和智慧。

可是如许极度的自信和自我认知，毕竟浅薄、粗糙，自大、膨胀。在人类无节制地改造、干预之下，大自然面目全非。虽然至今有人依然自得于自然的伟力，却终究不免被大自然反击。骄横自大的恶果，于今已经人人都在品尝。

人不是万物之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并不比花鸟鱼虫、飞禽走兽高贵，相比它们而言，人充其量只不过心眼多一